

家庭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的重要途径

卢 锋¹, 张舒予²

(1.南京邮电大学 传媒与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2.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 当前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存在着忽视对中国媒介政策与文化的分析、忽视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传统、对家庭在媒介素养教育中的作用重视不足等问题。在学校媒介素养教育全面推进不顺利的情况下,家庭教育以其在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在中国具有的特殊地位,有可能成为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的重要途径。开展家庭媒介素养教育实践,要注意以更新教育理念为基础,以提升家长媒介素养为中心,以培养良好的媒介接触习惯为主线,以培养分析和评价能力为核心,以加强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为重点。

[关键词] 媒介素养教育;家庭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 G459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卢锋(1974—),男,广东高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媒介素养教育和数字影视研究。E-mail: luf_2005@163.com。

一、引 言

本土化是一个使用非常广泛的术语。尽管各学科领域关于本土化的表述常常会有不同,但总的说来都是“因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知识分子对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外国学术范式不满而作出的一种反应”。^[1]本土化运动的倡导者十分注重文化的民族性,强调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不能简单替代。^[2]多年来,社会学、教育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各学科领域积极开展本土化研究,或借鉴国外理论,或弘扬本国传统,或开展本土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所说媒介素养教育的本土化,是指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活动的媒介素养教育,对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合理成分进行改造,使其融入中国文化并成为中国本土媒介素养教育一部分的过程。

媒介素养教育的理念和思想自20世纪90年代末传入中国以来,经过众多研究者的关注、推广、参与和投入,现今已成为了一个多层次、跨专业、交叉学科

的学术热点。^[3]随着对媒介素养教育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的逐渐深入,研究者们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出发,针对青少年、大学生、成年人等不同群体,探究在中国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模式和方法。人们常说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已经成为了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三大主体。

尽管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将媒介素养教育落实到学校层面是一个良好的途径,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媒介素养教育仍然未能达到在各级各类学校全面系统开展的状态,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的全面推进并不顺利。从全国范围看,在高校中,通常是只有一些开办新闻学、传播学相关专业的学校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课程;而在中小学,则只有少数一些与科研院所等有合作科研项目的学校开设了相关课程。

一方面是学术研究的“满腔热情”,另一方面却是学校实践的“不冷不热”,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开始向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领域寻求新的突破。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家庭媒介素养教育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0YJC880083);2010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科技创新活动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的干预研究”(项目编号:2010SJD880016)

二、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研究现状

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本土化研究,首先要厘清本土化与全球化、现代化的关系。全球化与本土化是一对辩证统一的范畴,两者之间没有根本的矛盾可言。首先,全球化要以本土文化的多样性为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和促进了本土化的发展;其次,本土化是对全球化的回应,它的发展也有利于推进全球化的进程。

从社会学、教育学和传播学等学科的本土化经验中可以看出,各学科都不约而同地从本土实践问题出发,强调理论体系、学术队伍和方法论的建构。同样,其他国家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也都从各自的媒介环境、媒介政策、教育体制出发,注重与本土问题和媒介素养教育传统的结合。如加拿大的媒介素养教育主要是为了保护本国文化免受美国文化的入侵;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是为了保护本国文化传统,使国民远离大众媒体的“低水平满足”;作为电影的诞生地,法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与电影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中国台湾则期望通过提高青少年的媒介素养,解决因电视媒体暴力、色情等所引发的青少年恶性犯罪频发等社会问题。这些国家、地区的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经验启示我们,努力形成政府、学者、媒体机构、民间团体、学校、家长等全面参与的局面,是媒介素养教育成功开展的重要基础。

通过对中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发展历程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经历了本土吸纳、本土生成、批判反思三个阶段,正在朝着推陈出新的目标努力前进。^①我国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的基本范式与教育学理论发展的基本“范式”是相近的,即从“翻译”、“介绍”发展为“述评”、“编撰”、“自编”等一系列的消化吸收,并随着吸收对象的更替而多次循环。如果详细对这一过程进行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基本理念: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的基本假设是将国外具有普遍意义的、能反映媒介素养教育基本规律的成果引入我国,如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组织主席约翰·庞吉特(John Pungente)提出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十大目标”、“媒介素养教育的八大理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欧洲议会媒介素养教育问题咨询顾问莱恩·马斯特曼(Len Masterman)提出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十八项

原则”等。

从2004年开始,对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关注更是成为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源泉。在对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理论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研究者也开始了对媒介素养教育深度本土化的反思,他们试图构建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体系,思考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路径、学校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模型的建构等问题。

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其一是“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的本土化”。这一层次又包括两个过程,一是运用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的框架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如媒介素养教育理念与德育、信息素质教育的结合;二是在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根据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确立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体系与框架。

其二是“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本土化”。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本土化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媒介素养教育在我国的推广与运用,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儿童基金会在中国推动的媒介素养教育项目;二是我国课程改革中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例如黑芝麻胡同小学从校本课程的开发建设中找到了突破口,开展了相应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南京师范大学视觉文化研究所则从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教育相结合的角度,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课程。

在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

第一,忽视对中国媒介政策与文化的分析。纵观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引入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的引入并未真正对原有理论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包括其理论产生的背景、当时的社会特征以及别国的文化研究传统等。由于对这些理论产生背景的分析及其在教育改革的意义、中外文化传统的差异等方面分析不足,必然会导致理论在我国的“水土不服”,从而导致从国外借鉴或引入的媒介素养教育难以在国内生长。

第二,忽视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传统。以国外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为主,以中国的现实问题为其理论

^①在本土化的四个阶段中,“本土吸纳”阶段可以称为“初级本土化”,“本土生成”、“批判反思”和“推陈出新”阶段则可以称为“高级本土化”。在“高级本土化”当中,“本土生成”阶段旨在对中国本土的问题进行广泛研究,是一种“广度本土化”;批判反思阶段以培养独立的判断力和原创精神为目标,可以称为“深度本土化”;而推陈出新阶段是为了使中国的理论研究融入世界,它也标志着本土化的完成。当然,这样的四个阶段并非截然分开的。只有不断反思本土化研究的局限性和社会制约,并在不断反思的过程中逐渐融入世界理论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媒介素养教育的本土化。

“注解”,是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种做法的理论前提是,我国原本没有媒介素养教育,中国的媒介素养教育是从西方国家“化”来的,媒介素养教育是西方社会的“舶来品”,我国传统教育中没有媒介素养教育。其实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国从1815年近代中文报刊诞生以来的中国社会已经存在具备现今我们所提的媒介素养教育某些内涵特征的活动,并且其活动形式也随着历史时代的变迁而不自觉地发生了变化。^[4]实际上,在中国现有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媒介素养教育也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内容。如中小学、高校开展的影视教育、信息技术教育等相关课程,对电影、电视、网络等媒介的欣赏、解读、使用等知识都有所涉及,只不过其教育思想与西方的媒介素养教育思想有所不同。

第三,对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在媒介素养教育中的作用与研究重视不足。尽管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作为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三大主体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但对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在媒介素养教育中的作用与研究却不够重视。以2007—2009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文献为例,以“篇名”为检索项,“媒介素养教育”为检索词,通过“模糊”检索得到的332篇文献中,与“学校教育”密切相关的有176篇,而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直接相关的分别只有12和0篇。

三、家庭教育: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的重要途径

伴随着学校实践的“不冷不热”,家庭教育却以其在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在中国具有的特殊地位,有可能成为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的重要途径。

1. 家庭: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场所

家庭是少年儿童绝大部分媒介行为的发生地,也是他们受媒介影响的主要场所。作为孩子在课堂之外认知、辨别和使用媒体最为直接的指导者,家长在少年儿童媒介素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十分关键作用。家庭教育被称之为“推动媒介素养教育的外围路线”^[5]。

在媒介飞速发展的今天,家庭教育对媒介素养教育确实有着非常旺盛的需求。面对媒介无处不在的影响,家长们或是以“保护主义”的做法,把孩子与媒介隔绝开来;或是以一种积极的“甄别模式”,陪同孩子接触媒介并与之讨论;或是根据自己对媒介的辨识和批判,以各种形式保障孩子免受媒介不良信息的干

扰。无论是2007年中国家长对武侠动画片《虹猫蓝兔七侠传》暴力、血腥画面的批判所引发的国内对净化动画片内容的讨论,还是1973年美国纽约的一位父亲对电台节目的投诉从而致使最高法院判决要求对广播电视节目中的“下流内容”进行限制,^[6]都充分显示了家庭在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中发挥的重要促进作用,家庭成为了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场所。

2. 家庭教育在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由其特点决定的

家庭能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场所,是由家庭和家庭教育的特点决定的。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基础,更是少年儿童初期媒介素养教育切实可行、卓有成效的方式。家庭教育的感染性、针对性和灵活性等特点,使其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也决定了它在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比,以亲子关系为中心的家庭教育具有自身独特的感染性优势。由于父母与子女有着血亲关系和情感联系,因此,父母的行为举止(如媒介行为、使用习惯等)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产生强烈的教育效果。

其次,家庭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往往都是个体的家庭成员,对人的影响教育较之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更容易做到“有的放矢”、“因材施教”。家庭成员朝夕相处,彼此能很全面、很深入地相互了解,因而,父母对子女的思想动向、性格特点、个性发展趋势、媒介接触行为等能较为清楚地感知,同样,子女也可对父母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这就有助于家庭教育的针对性,有助于家庭选择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教育时机和教育内容。

第三,与学校教育具有明确的教育计划、教学大纲、系统的教材内容、教育方式方法、严格的规章制度保证所不同,家庭教育寓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从物质生活的吃、穿、用到精神生活的家风、家规、人际关系以及文化生活如读书、看电视、使用网络、读报、谈心、聊天等,都包含着教育的因素,不求系统,灵活进行。在家庭成员的自由接触中,家长的各种观念、行为都会无拘无束地流露出来,并对子女产生影响。因此,在平时子女接触媒介的过程中,如果家长能敏感而机智地抓住教育时机予以正确引导,就会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7]

3. 家庭教育在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重视家庭教育是世界各国的一个普遍现象。它对于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开展具有尤为特殊的意

义。由于家庭在我国古代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我国自古就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当今,家庭教育在我国更是受到了超乎寻常的普遍关注。

我国传统家庭教育在目标上重视做人教育,在内容上重视诚实守信、勤奋学习、孝敬父母、勤俭节约等伦理道德教育,在方法上注重言传身教。这些特点,为家庭媒介素养教育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观不但是家长对少年儿童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的强大驱动力,而且是家长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重要资源。深入了解我国家庭媒介素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开展家庭媒介素养教育的原则,是当前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理论价值或现实意义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家庭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促进学校、家庭的积极合作,并进而努力形成学校、家长、政府、学者、媒体机构和民间团体等全面参与的格局,是突破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瓶颈”、成功推进媒介素养教育开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当前在我国家庭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是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本土化的重要途径。

四、家庭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路径选择

当前,发挥家庭教育在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当中的重要作用,要注意以更新教育理念为基础,以提升家长媒介素养为中心,以培养良好的媒介接触习惯为主线,以培养分析和评价能力为核心,以加强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为重点。

1. 以更新教育理念为基础

多年来,媒介素养教育应该如何开展,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受国外媒介素养教育传统的影响,不少教育工作者坚守于一种“保护主义”的教育立场,力求通过媒介素养教育,使学生免受媒介所传播的不良文化、道德观念或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看到,这种“保护主义”的立场,“忽略了青年人在媒介环境中可能获得的各种应对经验”,而且“未能教给学生如何适应急剧变化的媒介环境”。^[8]这也使得一种超越早期保护主义的媒介素养教育理念在英国脱颖而出。

在我国,以卜卫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也开始从儿童媒介需要的研究出发,主张教育工作者要形成正确的媒介观和儿童观。卜卫认为,至少有两个理由来肯定儿童的媒介需要。首先,娱乐是儿童的天然需求。根据国际《儿童权利公约》,儿童的休闲权应该得到保证,并且其自由选择媒介内容的权利也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如对暴力和色情内容的限制等)得到保证。其次,对自由时间较少的城市儿童来说,媒介是娱乐工具而非教育工具,这不仅对儿童身心健康有好处,而且也是非常现实的选择。在有限的时间内,儿童接触媒介往往是为了满足放松、逃避现实、情绪刺激、交往诉求、快乐诉求、现实性诉求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接着上课。^[9]

以上相关的研究提示我们,在实施家庭媒介素养教育的过程中,需要以素质教育的理念为指导,采取“积极建构的保护主义”的价值取向,即在教育目标上应该既有保护的色彩,也有积极建构的诉求;在教育模式上要强调学生的积极参与,努力构建以媒介参与为核心理念的新型教育模式。

2. 以提升家长媒介素养为中心

家庭教育是青少年学生媒介行为习惯和媒介素养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家长在青少年学生媒介素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10]例如,“大量的研究证明了儿童……(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宗教信仰、家庭沟通形态……与儿童电视接触频度、接触时间和内容偏好等有关。”^[11]近几年的相关研究发现,家庭中网络设备数量与电脑素养成正相关,中小學生家中电脑资源设备越丰富,其电脑素养越高;父母亲会使用电脑的学生,具有较正向、积极的电脑态度。^[12]陆晔等进行的上海学生“离网离视”小活动也表明:家庭关系对青少年的媒介使用有相当重要的影响。^[13]

家长是家庭媒介素养教育的责任者、执行者,在家庭媒介素养教育中起主导作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比,有较大的独立性和随意性,受家长影响较多,受社会监督较少。家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家庭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

家长的媒介素养是影响家庭媒介素养教育质量高低的关键因素。从笔者调查的结果看,^①尽管不少高

①笔者开展的调查是以南京主城区中学生为典型个案展开的。由于本研究对媒介素养的界定,要深入了解学生媒介信息的获取、分析、评价、创造与参与的能力,要求调查对象有较丰富的媒介使用经历。为此,本研究将调查对象确定为高中学生。根据南京市教委相关同志提供的高中名单,我们从鼓楼、白下、玄武、下关、秦淮和建邺六个主城区的学校中随机抽取了10所,在每一所学校又从高中一、二、三年级中随机抽取2个整班,共抽取学生712名,这些学生就构成了本次学生卷调查的样本。调查时由调查员于中午学生休息时间到达班级展开,以自填问卷的方式进行,并当场收回。最终实发问卷数、回收问卷数、有效问卷数和有效回收率分别为705份、692份、626份和88.79%。

中生家长对媒介制作过程的了解程度不高,媒介批判意识、创造与参与意识也低于孩子,但对于那些了解媒介制作过程、有较强的媒介批判意识、创造与参与意识的孩子而言,父母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通过媒介获取信息的方法上,父母的作用位列第三(34.24%);在对报纸制作过程、广播节目制作过程和电视节目制作过程的了解上,父母的作用分别位于第二(22.29%)、第三(14.67%)和第三(14.83%);在媒介分析与评价态度的形成方面,父母的作用位列第二(42.49%)。

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的顺利开展与推进,同样离不开家长的支持与配合。为此,应建立家校合作、社会培训等合理机制,不断提高家长的媒介素养,促使其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3. 以培养良好的媒介接触习惯为主线

家庭作为人生的第一课堂,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个体社会化的首要场所,对少年儿童素养的培养有重要影响。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人们是经由惯习(Habitus)来处理社会世界的。而惯习形成于社会结构,任何人身上的惯习都是和他自身生活历程密切相关的。家庭影响着青少年学生惯习的形成。^[14]家庭“社会化”的影响力量,可以造就子女不同的媒体使用习惯。^[15]在接受家庭教育过程中,青少年学生不断习得家庭所认同或提倡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和价值观念。青少年学生不同的媒介兴趣需求、相异的媒介使用习惯和媒介素养也同样受到其成长的家庭因素和父辈媒介使用习惯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家庭教育在孩子媒介接触行为的指导、监控方面的重视程度并不高。调查显示,经常引导孩子阅读报纸、选择广播节目和选择电视节目的家长比例分别只有15.35%、13.83%和27.43%;经常陪同孩子阅读报纸、收听广播节目、收看电视节目和上网的家长比例分别只有27.72%、32.6%、48.29%和9%;经常与孩子一同讨论报纸、广播节目、电视节目和网络内容的家长比例分别只有45.97%、29.43%、49.23%和20.49%。

在没有家庭教育指导和监控的情况下,学生接触媒介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调查显示,学生阅读报纸最主要的三个目的是了解国内外时事(44.54%)、娱乐消遣(39.40%)以及获得社会知识和开阔眼界(34.44%);经常收听的广播节目是戏剧、综艺、娱乐节目(69.38%)和社会新闻节目(36.56%)以及时事政治节目(23.44%);经常收看的电视节目是戏剧、综艺、娱

乐节目(70.38%)和社会新闻节目(43.85%)以及体育节目(37.88%);上网最主要的三个目的是放松心情、精神调适(78.16%)和娱乐消遣(75.89%)以及与同学、老师、亲友交流(60.03%)。可见,除报纸外,学生使用媒介的主要目的是娱乐。媒介对于学生而言,更多的是“玩具”。

由此可见,要更有效地避免媒介内容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家长需要更多的介入,包括进一步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的媒介使用习惯、对媒介内容选择的指导、与孩子共同使用媒介和讨论媒介内容等。

4. 以培养分析和评价能力为核心

“媒介素养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在媒介信息的强说服力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保持自己对问题的个人思考。”^[16]而这其实就需要人们以批判的眼光对待媒介及媒介信息。通过教育培养人们的分析、评价和解读媒介信息的能力便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目标。

调查显示,家长和学生的媒介分析与评价能力整体偏低。主要表现在:(1)家长对报纸、广播节目、电视节目和网站的制作过程的了解程度并不高。调查的结果表明,对报纸、广播节目、电视节目和网站的制作过程不了解和完全不了解的家长比例分别达到了63.11%、72.60%、66.94%和74.79%。(2)大多数学生对媒介的制作过程也不太了解。调查结果表明,对报纸、广播节目、电视节目和网站的制作过程不了解和完全不了解的学生比例分别达到了75.96%、70.34%和62.22%。(3)对媒介信息的批判意识不强。经常对报纸、广播节目、电视节目和网络媒介信息的真实性能有质疑态度的家长比例分别只有42.22%、37.65%、38.20%和53.46%;经常对报纸、广播节目、电视节目和网络媒介信息的真实性能有质疑态度的学生比例则分别为45.56%、41.89%、47.37%和62.17%。可以看出,家长和学生对于媒介的批判意识并不强,家长的批判意识还略弱于学生。

父母和教师最重视的就是培养孩子的信息分析与评价能力,他们对孩子使用媒介最大的担忧是媒介上大量的不良信息对孩子的负面影响。而长期以来我国媒介素养教育与德育、公民教育的结合,也对培养青少年、儿童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媒介信息,使孩子养成独立的对媒介的分析和评价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这正是家庭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目标。

5. 以加强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为重点

根据笔者的调查结果,家长平均每天上网的时间是51.47分钟。这个长度已经超过了学生(35.44分

钟)。网络又是当前家长和学生公认的可信度最低的媒介(调查显示,家长和学生都认为,媒介可信度从高到低分别是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然而,家长对网络媒介的监控是最弱的。43.34%的家长会在孩子上网前与其约定好上网时间长度,9%的家长经常陪同孩子上网,20.49%的家长经常与孩子一同讨论网站内容等方面的问题。

引导学生合理使用网络媒介是当前学校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青少年自身心理品质尚未定型,自我控制力较差,容易沉溺于网络而难以自拔。越来越多的关于网络成瘾的研究,已经促使家庭、学校、社会高度重视不良网络行为对青少年学生的危害。随着网络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必将成为未来学校、家庭媒介素养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五、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从教育学角度,调查了中国已有和现有媒介素养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以及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

需求,从教育需求出发,思考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本土化,这是一种与以往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不同的方法与思路。本文认为,以家庭教育为主体,从本土问题出发探索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本土化,既有利于促进媒介素养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建设,又有利于借鉴形式多样的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历史经验,从而避免现有研究中的国外理论、本国传统以及当代实践的矛盾与对立关系,逐步实现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的目标。

媒介素养教育本土化在我国的现实表现说明,我们不但需要对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给予更多的分析与研究,包括分析国外理论本身的精神实质、产生背景、研究方法以及操作程序所能运用的现实实践特征,从而形成对国外媒介素养教育既非仰视也非贬低的研究态度,同时,还要求对我国传统与当代实践给予关照,寻求国外媒介素养教育与我国研究传统和当代实践的最佳切合点,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实现真正的本土化。

[参考文献]

- [1]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70.
- [2] 崔景贵.文化学视野中的我国心理教育本土化[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2(1):84~88.
- [3] 汤书昆,孙文彬.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述评[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9,(2):16~20.
- [4] 谢小红.1815—1949 萌芽与非自觉状态的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7.
- [5] 张学波.我国媒体素养教育发展策略探讨[J].电化教育研究,2009,(7):12~16.
- [6] 袁军.媒介素养教育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62~63.
- [7] 邓佐君.家庭教育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7.
- [8] [英]大卫·帕金森.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超越保护主义[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2):73~79.
- [9] 卜卫.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161.
- [10][12] 江宇.家庭社会化视角下媒介素养影响因素研究[D].北京:中国传媒大学,2008.
- [11] 卜卫.关于儿童媒介需要的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3):14.
- [13] 陆晔,黄东亮,周葆华.媒介使用与青少年闲暇生活——“离网离视”活动个案分析[J].新闻记者,2006,(4):3~6.
- [14] 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M].杨淑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91~192.
- [15] 邱庆华.传播形态与儿童电脑网络态度之相关研究——以台北市高年级学龄儿童为例[D].台湾:中国文化大学,2001.
- [16] Art Silverblatt. Media Literacy: Keys to Interpreting Media Messages [M]. Praeger Publishers, 2001.